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极限思维的理论寻绎及当代价值

韩 隽 张山杉

摘 要: 自党中央首次提出极限思维一词以来,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要深刻把握极限思维的科学内涵,必须立足其出场和发展逻辑。极限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共鸣,且蕴含着深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极限思维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方法的发展与运用,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赓续。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防范化解“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极限挑战,必须充分发挥极限思维的当代价值。既要正确处理“风”和“浪”的关系,又要下好先手棋,积极谋求战略主动,更要以顽强的斗争精神来迎接极限的洗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

关键词: 极限思维;中国式现代化;底线思维;风险挑战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82-06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然其道路并非一马平川。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形势局面,要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就必须以极限思维审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防范化解各类潜在的风险矛盾。

一、中国语境下极限思维的出场逻辑

极限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最早应用于数学领域,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极限处理来审视事物的变化特征。知其源则可壮其力。2023年5月30日,在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出现极限思维一词。这是该词首次被党中央重要会议所提及,也意味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对极限情况的有效防范和化解。梳理归纳极限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出场和发展逻辑,既是科学把握并有效发挥其思维

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将这一科学思维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1. 极限思维一词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提出过程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极限思维一词在中央主要报刊中的运用主要集中于具体实践领域。如训练中要坚持极限思维、疫情防控中的极限思维、防灾减灾救灾中的极限思维、防汛救灾中的极限思维等。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极限思维一词的运用逐渐转向宏观战略层面。《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三次提及极限思维,分别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挑战”^{[1]48}，“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制定处置系统性危机的预案”^{[1]277}，“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损害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形形色色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切实提高防范

收稿日期:2024-10-12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涉疆政策研究”(21XGJ005)。

作者简介:韩隽,女,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张山杉,男,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化解风险的本领”^{[1]566}。可以看出,在2022年下半年,极限思维已经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次提及极限思维的内容为党中央正式提出极限思维进行了必要的预热和铺垫。

2023年5月30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2]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在重要会议上明确提出极限思维。该词的提出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2023年7月11日,习近平再次强调,“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水平”^[3]。2023年9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4]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影响下,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着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极限思维的出场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指向性。

2. 对于极限思维内涵的既有认识

从现有成果来看,《学习时报》于2023年6月7日率先刊发《为什么强调极限思维》一文,对极限思维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界定:“极限思维,就是把所研究的问题或事物推至极限状态下进行思考的一种思维方法。说白了,就是在出现极端情况时,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它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不能及’。”^[5]随后,一些媒体如《解放军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也相继刊登关于极限思维的理论文章,进一步阐释极限思维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如题为《坚持极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文指出:“所谓极限思维,就是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将所思考的问题及其条件进行理想化假设,当假设被推至极大或极小的极端状态时,问题的本质便会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暴露出来。”^[6]除极限思维的内涵界定外,现有研究成果还从“极限思维与国家总体安全的关系”“极限思维与底线思维的辩证关系”“极限思维蕴含的辩证法思想”以及从方法论角度论述“如何运用极限思维”等方面进行阐述,为学界在今后研究过程中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引导和方法借鉴。

综合来看,我国学术界对极限思维的基本内涵已取得初步共识。其一,极限思维是指通过某一问题或事物相包含、相关联的要素条件,通过极限化的处理,模拟出极限状态,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如何规避、怎么应对的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其二,极限思维的现实目标指向在于防范和化解今后时期我国可能面临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风险挑战。其三,坚持极限思维的方法要求是“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通过“下好先手棋”来争取战略主动。其四,为进一步发挥极限思维的现实价值,还应在主观上具备“极限心理”,在认识上持续积累“极限经验”。

二、极限思维的理论溯源

极限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既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着高度的哲学共鸣和思维契合,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重唤。对极限思维的理论溯源是深刻把握其理论意蕴和核心要义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其有益的补充与诠释,更是进一步激活其现实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

1. 极限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呼应共鸣

极限思维的内在哲学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共鸣,即同样蕴含着联系观,遵循着质量互变原则,彰显着对立统一规律。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为极限思维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和完善供给无穷养分。

坚持极限思维,就需要以联系的整体性视野多维窥探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恩格斯指出:“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7]一方面,事物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充分把握某一问题或事物同外部环境的联系、其他问题或事物的联系以及同自身内部诸要素的联系,是科学把握各种变量对事物影响的关键所在。如果抛弃联系观而运用极限思维,仅在单一要素的极值中看待问题,那么得出的一切结论将始终无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另一方面,事物联系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联系都分别采取各自特殊的具体形式。这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掘某一问题或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层次、隐性联系,又要以多样性视野审视不同的联系形式与方式。与此同时,要坚持以客观规律为依循,避免在运用极限思维的过程中漫无目的地扩大或缩小问题域,始终注重思维发散与思维聚焦

的有机结合。

极限思维的运用秉持质量互变定律的原则依循。质量互变是双向度的运动变化,既包括推动事物前进发展的积极意义变化,同样也包含存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激化和整体走向衰败倒退的消极变化。

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推送某一变量至极致状态来审视量变的趋势、把握度的节点、发现质变的必备条件,避免将极限思维同激变论和灾变论混为一谈。世界上不存在一蹴而就的质变,极端状态只是以结果的形式进行呈现,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长期的量变与积累。也就是说,“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质的质的”^[8]。脱离对量的关注,则无法科学推导某一问题或事物的极限。这也说明,在运用极限思维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能片面地对待极限情况,而应在重视量的变化过程中适时审视极限。

另一方面,事物同样存在急剧恶性质变的可能性。这既包括因长期忽视部分量变而造成的恶性质变,也包括外力对事物原有运动轨迹颠覆所造成的恶性质变。对此,既要思考如何在形势向好的情况中勇于开创新局,站稳新的基本盘,也要及时跟进掌握因量变所产生的局部性部分质变的具体情况,防微杜渐,谨防底线失守。

坚持极限思维,就要坚持在对立统一的基点之上把握极限。极限的形成是统一体内多种矛盾运动的结果,它既包括事物运动变化的上限和下限,同样也是有限和无限的分界线,甚至在特定环境和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列宁曾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9]。科学运用极限思维,应当利用好对立统一规律这把“金钥匙”。其一,要坚持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既要推动有利因素最大化地从有限向无限发展,持续扩大向好面,又要始终保持敏锐的预警察觉能力,能够遏止不利因素从有限向无限的蔓延与恶化,避免有限的矛盾风险向无限面转化。其二,要坚持上限与下限的对立统一。既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以内生动力突破上限,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又要严守底线,避免形势的恶化与堕层;既要在突破上限后,稳定基本盘,也要在底线被凿穿的被动形势下,力争重塑底线。其三,要坚持“力所能及”与“力所不及”的对立统一。坚持长期做好“力所能及”之事,是有效避免“力所不及”情况发生的有效途径。当面对“力所不及”的境况时,要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状态,将被动局面转化为激发潜力、提升

能力的机遇,为将过往的“力所不及”转化为今后的“力所能及”创造一切可能条件。

2. 极限思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赓续

极限思维自古便蕴藏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极限思维既是一种思维形态,也是一种行为形态,更是一种文化形态。极限思维的当代表达与运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激活。

一方面,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预立思想”,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知里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与文化积淀。《礼记·中庸》率先提出“预立思想”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①。做好“预”的必要准备,既是“立”的关键,更是防止“废”的情况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诸如“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等,同样是古人以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警醒后人要秉持“预立思想”,防患于未然。《孙子·计篇》记载:“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②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预先筹谋,避免极端情况的发生。由此可见,运用极限思维发挥“预”的作用,是有效规避“废”的发生的重要方式方法;反之,则“不预难立”“不立必废”。

另一方面,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饱经患难所形成的重要生存发展智慧,并作为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为历朝历代王侯将相所持重。《孟子·告子下》论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③唐朝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特别提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④等思想。从上述经典中可以直观感受到,忧患意识的丧失往往与“危”“溃”“亡”等极端境遇相关联。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忧患意识”往往以极限思维表现为“生死存亡之道”,具备忧患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庭保持长久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必要条件;反之,则容易骄奢淫逸,走向灭亡。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载:“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⑤概言之,我国古代典籍篇章中虽鲜有明确提到极限一词,但将极限思维的理念、方法贯通于忧患意识的各种解读之中,融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之中。新时代,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极限思维与底线思维的 联系统一

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作为科学的思维方法,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统一。坚持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是促使两种科学思维方法实现思维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厘清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的科学内涵,是正确把握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前提。底线思维是一种“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10]的科学思维方法,回答的是如何做到“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争取最好结果”的问题。极限思维是指把研究对象推到极限状态下进行思考的科学思维方法,回答的是在面临“超出预期”“凿穿底线”甚至“史无前例”的情况下,该如何面对问题。由此可见,底线思维是谋划预期之内的科学思维方法,而极限思维更多强调的是如何面对预期之外的难题挑战。这两种科学思维既有区别与联系,又能实现彼此间的补益。

1.“极限”与“底线”的内在联系

底线思维是极限思维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只有充分做好预期之内的事情,才能更为从容地面对预期之外的事。在“以预防废”中,下好先手棋,争取战略主动,是避免出现极限情况的必要前提。这里的“预”实际上是将“超出预期”“凿穿底线”的情况视为所谓的“忧患”。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11]由此可见,守好底线是有效规避极端风险、避免系统性矛盾和灾难的关键所在。

极限思维是底线思维的延伸和扩展。其一,从出场次序来看,自2013年7月25日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底线思维多达百余次。对比2023年5月30日首次出场的极限思维而言,晚于底线思维的提出近十年。其二,从表述逻辑来看,党中央在强调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之时,按照“底线思维在前、极限思维在后”的话语逻辑进行表述,着重突出了二者之间的递进关系和有机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极限思维的提出本身即蕴含着“底线失守

该怎么办”的深意,体现出党中央对可能升级的外部风险的更深层次的研判与驾驭。其三,从现实意蕴来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复杂形势和重大风险挑战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难度不断加码。以极限思维对底线思维进行扩展和补充,是应对我国今后所要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现实需要。当前时期,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仅需要具备底线思维来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更要以极限思维提前谋划未来时期可能存在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复杂局面。

2.极限思维与底线思维的辩证统一

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虽是两种独立的科学思维方法,但二者之间相互贯通。坚持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不仅是发挥这两种科学思维方法最大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正确运用这两种科学思维方法的基本遵循。其一,既要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规避极限,也要在“凿穿底线”的极限情况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方面,要始终明确底线是什么、在哪里,“凿穿底线”的危害是什么,并以底线为基,客观谨慎研判未来;另一方面,面对“凿穿底线”“超出预期”的情形,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力求在极限中突破自我。其二,坚持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将现有要素进行极限化处理。一方面,要坚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特征、运动轨迹以及本质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系统、发展、全面的视野,既要看到内部因素的极限化可能性,又要清醒认识到各事物间交织产生的极端情况。其三,坚持把“始终做好自己的事”作为应对极端情况的基础和保障。部分极限情况的出现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一定是不可取的。一方面,现有因素是一切极端情况的孕育母体。面对不可预期之事,最好的方式则是“做好自己的事”,同时也切忌陷入杞人忧天或者“惊弓之鸟”的错误心态当中。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地发现、重视现存因素中不易察觉、容易忽略的风险因素,提前干预制止存在恶性质变的风险苗头。其四,必须客观承认存在“底线即极限”这一特殊状态。也就是说,在特殊状态下,底线和极限存在相互重合的状态。在此类情况下,一方面,要把“底线当极限”而非把“极限当底线”,二者不容颠倒。把“底线当极限”是坚定根本立场的根本体现,把“极限当底线”实际等同于“毫无底线”。另一方面,在原则性问题上,要把底

线视作极限,对此,不能产生偏差和错误,否则将产生颠覆性危机。因此,要辩证运用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形成二者的思维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行稳致远。

四、坚持极限思维的当代价值

极限思维的提出始终坚持目标导向,有着鲜明的现实意蕴。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12]坚持极限思维的根本目的在于勇于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保持敏锐的战略判断力,下好先手棋,积极争取战略主动。既要努力做到“都想到”,也要对“想不到”有所准备,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正确认识所谓的“极限挑战”往往也意味着“危中有机”,要善于在极限中抓住机遇,寻求突破。

1. 科学审慎把握好“风”和“浪”的关系

习近平多次以“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词语比喻风险挑战。这种话语表达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风险挑战加以形象化的呈现。“风”和“浪”的形式多种多样。“风平浪静”“风高浪急”以及“惊涛骇浪”三者间一体贯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是矛盾风险演变后的最坏形势。从演变逻辑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演变的结果。在此之前,运用极限思维科学把握“风平浪静”阶段是有效规避“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关键所在。其一,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要以“预能力”切断风险和危机产生的可能。如我国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应在各类重点领域制定周密的应急预案,防止“天灾”演变为“人祸”,避免形势朝向“惊涛骇浪”恶化。其二,部分风险和矛盾存在越级演变的可能。如“风平浪静”的状态一旦受到极端因素的影响,可能会直接转化为“惊涛骇浪”的严重局面,因此,应主动规避社会矛盾在外力作用下的极限升级情况,以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抓手,重点解决容易升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消弭潜在的社会矛盾引爆点。其三,运用极限思维离不开树立正确的极限心理。也就是说,要实现“运用极限思维”和“具备极限心理”二者之间的

统一。须在“风平浪静”中居安思危,在“风高浪急”中面不改色,在“惊涛骇浪”中敢于斗争;同时,要坚决避免在“风平浪静”中放松警惕,在“风高浪急”中惊慌失措,在“惊涛骇浪”中一溃千里。

2. 主动下好先手棋,谋求战略主动

下好先手棋、谋求战略主动,是科学运用极限思维的本质要求,同样也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其关键在于“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打算”。习近平指出:“要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道路,关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并联式发展道路。但也需要认识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社会矛盾因自身的快速发展,存在交织并发的可能性。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转型、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应对国际竞争压力等问题是各个现代化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难题,而我国则需要相对较短的时间阶段内集中面对。除此之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四多亿的人口体量虽然是一种优势,但任何潜在风险矛盾同庞大人口基数相交织,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样难以估量。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在发展进程中呈现着低容错率的特性。故此,科学运用极限思维,对于后发型并联式现代化国家而言具有重大意义。面对潜在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倘若不能以极限思维“作最坏的打算”,往往将会导致在风险矛盾呈现之时陷入被动局面,阻碍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程。发挥极限思维的当代价值,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的必然要求。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来看,对部分潜在的、深层次的风险矛盾的防范化解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面对大党独有之难题、全面深化改革的下行压力、经济社会发展动能驱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务必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4]。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国际社会的共有难题,必须谨防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围追堵截。科学运用极限思维,必须“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潜在的极端风险矛盾,作最坏的打算,并向最好处持续发力,勇于同一切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拦路虎、绊脚石进

行斗争。

3. 以顽强的斗争精神迎接极限的洗礼

习近平指出：“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才能赢得尊严、赢得主动，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5]坚持极限思维的现实价值，关键在于充分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在斗争中防范化解可能产生的极限情况。一方面，敢于斗争是善于斗争的前提。敢于斗争，意味着我们要坚持极限思维，敢于“自找苦吃”，主动发现潜在的风险和矛盾，将其苗头遏制于未然，避免其从未然走向必然，从而防止造成颠覆性错误。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另一方面，善于斗争在于实现“预能力”与“极能力”的有机统一，将潜在的风险矛盾化于无形，尽可能地避免事后发力、事后弥补。现阶段，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中“危与机”并存。以极限思维科学处理“危与机”的辩证关系，是实现转危为安乃至转危为机的重要战略思维。

除此之外，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纵深，离不开“极限心理”与斗争精神的思维统一，这是进一步释放主观能动力量的有效途径。唯有坚持极限思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才能拓宽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注释

①参见李凌云、纪双鼎主编：《论语·大学·中庸》，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年版，第251页。②参见陈曦译注：《孙子兵法》，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页。③参见中国孟子研究院编：《〈孟子〉七篇解读》，齐鲁出版社2018年版，第822页。④参见吕祖效：《魏征谏言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⑤参见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0页。

参考文献

-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3-05-31(1).
- [3]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N].人民日报，2023-07-12(1).
-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N].人民日报，2023-09-27(1).
- [5] 徐文秀.为什么强调极限思维[N].学习时报，2023-06-07(1).
- [6] 王高贺，陈方玉.坚持极限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7-21(1).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
- [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7.
- [9]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6.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0.
- [11]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中国民政，2023(10)：4-5.
- [1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N].人民日报，2023-02-14(1).
- [13] 习近平.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N].人民日报，2020-10-11(1).
- [14]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3-02-29(1).
- [15] 习近平.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J].当代党员，2023(14)：1-6.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Extrem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n Jun Zhang Shanshan

Abstract: Sinc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first put forward the term “extreme thinking”, i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deeply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extreme thinking, it is necessary to base ourselves on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logic. Extreme thinking, as a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 highly resonates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ontains prof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treme thinking is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rxist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but also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leverag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extreme thinking to guard against and resolve the extreme challenges of “high winds and high waves, even terrifying waves”. We should not only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nd” and “waves”, but also play a proactive role to actively seek strategic initiative,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should meet the baptism of extremes with a tenacious spirit of struggle to ensure that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stable and farsighted.

Key words: extreme think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bottom-line think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责任编辑：翦 榛